



# “肝胆颂”重千钧

□ 杨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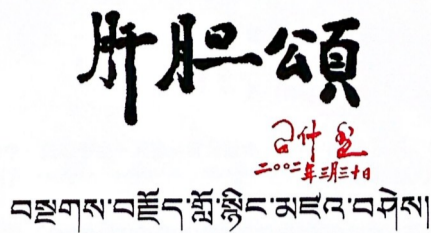


2002年3月30日,习仲勋同志为甘肃一位省级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合集题写“肝胆颂”书名。这本书回忆了作者与十世班禅、肋巴佛、贡唐仓、黄正清、杨复兴、马丕烈6人相识相知相交的一些往事,是展示甘肃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的一个缩影。“肝胆颂”三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书名,它还饱含着一位我们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对统一战线事业的深邃思考。

情系社稷,彰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习仲勋同志奋斗革命一生,始终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奋斗初心和工作主旨。从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主政大西北,到中央领导机关负责重要工作,他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在陕甘革命时期,习仲勋同志曾参与建立回民支队,成立三嘉堡回民自治政权。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期间,亲自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长,他深刻认识到民族问题在西北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曾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推动中央批复复办西北民族学院,发展成今天的西北民

族大学,始终与十世班禅、赛福鼎、包尔汉、黄正清等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在中央长期分管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科学方法,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更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宗教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同志曾回忆说,他一生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是从事统战工作。正是因为对西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一贯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宗教界人士的一贯尊重和深厚情谊,习仲勋同志才能抱病题写这本合集的书名。

赤子之情,流露出关心同志、舍生求义的无我情怀。据本书作者回忆:当时他是到深圳看望身体不太好的习仲勋同志,怀揣着这本合集,个人认为书中所写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都与习仲勋同志熟知,习仲勋同志在他们心中威望最高,只有习仲勋同志对他们和书中说的事最了解,所以给齐心同志和秘书汇报了请习仲勋同志为合集题写书名的想法。他们(齐心同志和秘书)很了解习仲勋同志对作者的关心,所以没有拒绝,说会找一个好一些的机会给习仲勋同志提出来。当时习仲勋同志已坐上轮椅,没想到刚过三天,习仲勋同志就题写好了书名。齐心同志把题字交给作者时叮嘱说,这可能是习仲勋同志的绝笔,让作者永远保存留念。习仲勋同志当时重病在身,求写书名的老同志虽然也因为工作原因与他有近20年的交往,但毕竟只是自己下级,完全可以不写。在题写书名后54天,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同志就因病逝世。“肝胆颂”三字,成为习仲勋同志对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重托。这三个道劲有力的大字,体现着习仲勋同志对老同志、老朋友、老下级的关爱,体现出习仲勋同志一贯重视同志之情、革命友谊的宝贵传统。这是一种忘我、无私的胸怀境界,也是一种重情重义崇高人格魅力的体现。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宝贵情怀和品格,早在陕甘革命斗争时期就有突出体现。当时,他在面对错误肃反时,宁愿坐牢、被杀



头,也不愿出卖同志,说违心话。

关心未来,体现着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期许。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各民族在共创中华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西北历来是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共同繁衍生息的地方,对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社稷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甘肃在西北的发展稳定中有着重要作用,甘肃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关乎着西北乃至全国的大局。习仲勋同志题写“肝胆颂”这样的书名,请求的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的一位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在甘肃长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针对的是甘肃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杰出代表,体现出习仲勋同志对书中人士为革命建设事业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体现着习仲勋同志对甘肃民族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肝胆颂”三个字,寄托着作为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习仲勋同志,希望后来者能够继承宝贵革命工作传统,高度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始终保持与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良好关系的殷殷重托。

好作风、好传统、好品格需要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习仲勋同志的题字犹如黄钟大吕,正在激励着新时代陇原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首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协奏曲正在响彻“如意甘肃”,一部部民族和睦、宗教和睦、社会和谐“肝胆颂”正书写在陇原大地。

## ·人物纪事·

# 鲁迅的地质情怀

□ 刘志宏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是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巨匠,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谈及鲁迅,大家都会怀念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甚了解,鲁迅在地质学方面也取得过辉煌的业绩。他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提及:“我首先正学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鲁迅少年时读的是私塾,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书中地理记述与神话传说交织的奇书让他魂牵梦绕,也他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古人地理世界中描绘的、充满了荒诞离奇想象的国家地理。

1898年鲁迅首次离开家乡,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一年后,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它是一所培养地质、矿物、道路工程等新式人才的学堂,接受的是刚刚起步的地质新式教育。

矿路学堂由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开办,仿照德制,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班学生(1898年10月—1902年1月,共24人)。学习

期间,他非常刻苦,学了《矿学》《地质学》《测算学》《测图学》等课程,在教材的书页空白处记了很多听课笔记、学习心得等;花大量时间抄录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浅说》译文内容,甚至把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最终,鲁迅成为班级中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赞:“周树人真是博学。”

1956年,中国近代学者许寿裳的夫人陶伯勤向北京鲁迅博物馆捐赠的多件遗物,其中包含9页鲁迅的地质手稿,经鉴定为是鲁迅在矿路学堂学习时的笔记,记录了他的勤奋和踏实。

他的毕业执照中这样写道:“学生周树人,现年廿一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期间,鲁迅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地质知识,还有深切的实践经历。1901年11月他和同学一起到句容县青龙山煤矿实习,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了当时新式的采煤方法。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曾回忆:“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着。”这次实习,不仅使他学到了地质和采矿的实践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对中国最早产业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恶劣环境有了真切体会

和实在的了解。

鲁迅在地质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在他的一生中,尽管从事地质生涯不过七八年时光,但凭《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一志一论”,足以名垂地质学发展史。

《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1903年第8期《浙江潮》杂志,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篇地质论文。尽管此后有史料发现,证明在鲁迅之前的数月也有地质文章发表,但他的《中国地质略论》这篇论文,绝对堪称近代地质学的启蒙之作。“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凝练而全面,分为绪言、外人之地质调查者、地质之分布、地质上之发育、世界第一石炭(石炭,即煤炭)国五个部分,并介绍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论述地球与宇宙的起源。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地质学”一词,并为它下了一个简约的定义:“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中国地质略论》不是一篇地质学的纯科学作品,而是从地质学科学知识中蕴发出的爱国主义“炽热的政论”。正是这篇论文的出台,为中国地质学史上第一部开山之作《中国矿产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连载上)

# 陇上非遗奇珍 ——永靖北乡“花儿”

□ 翟文伟

北乡“花儿”内容非常丰富。有传统的经千锤百炼而流传下来的歌词,也有触景生情、随口而出的即兴之作。传统的北乡“花儿”唱词中,以表现男女爱情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为主题的最多、最生动。由于这类“花儿”产生得最早,流传的时间最长,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众多的传唱者反复加工修改,数量多而质量高,是北乡“花儿”中的精品,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如歌唱赞美的北乡“花儿”唱词:“阴山阳山的山对山,好不过挡羊的草山;尕妹出来者门前站,活象是才开的牡丹”;“天上的星星对星,天河口里的亮星”;又如歌唱追求的北乡“花儿”唱词:“大马上驮的是五彩的布,尕马上驮的是枣儿;尕妹妹好比梅花的树,阿哥是探梅的雀儿”。

北乡“花儿”的内容,涉及了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朴实忠厚的北乡人在农作间隙,用“花儿”代言,寄情达意,借以抒发种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北乡“花儿”的内容也有富有特色的社会生活“花儿”。如北乡“花儿”唱词:“八坊里扎的是韩起功,干墙上钉钉子哩;麻眼睛不是吃粮的人,硬抓者顶名字哩”,这首“花儿”反映的是在1948年蒋马匪帮的统治下,韩起功抓兵连孤寡盲人也不放过的情形,揭露了马步芳统治西北给甘、青各地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北乡“花儿”被赋予新的内容,山间、地头、广场、茶园到处传唱,不仅搬上了舞台,还唱到了北京。内容中不仅有歌唱爱情,还出现了歌颂共产党、社会主义、民族团结、小康建设等新时代的内容。如北乡“花儿”唱词:“路是湾湾湾是路,大路上响铃铛哩;金黄的麦子翻波浪,麦浪们闪金光哩”;“青稞大麦啦煮酒哩,麦麸子拌两缸醋哩;小康的大路要走哩,人前头争一口气哩”;“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俊不过太阳的光彩;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好不过开放的时代”;“太子山高来黄河水长,临夏是花儿的故乡;感谢习主席感谢党,领我们走上了小康”等等。

在永靖,“花儿”歌手更是层出不穷,水平不断提高。1971年,青年“花儿”歌手张佩兰、杨培梅,被临夏州歌舞团选为专唱“花儿”的演员。1979年,回族花儿歌手李贵洲被省、州选调至北京演唱“花儿”,博得好评。1985年,在莲花山举办的全州“花儿”会大奖赛上,永靖花儿队荣获集体一等奖,李贵洲和汉族歌手刘莲梅等荣获男女独唱、对唱一等奖。1998年,永靖回族歌手李贵洲和汉族歌手姬正珠应新西兰惠灵顿国家艺术剧院邀请,在歌剧《路易·艾黎在中国》中担任中国“花儿”的独唱和领唱,并博得好评。近年来,涌现出的北乡花儿优秀歌手还有祁福录、司福莲、潘尚光、朱德云、魏登贤、罗进华等,这些歌手均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在全省、全国的民歌演唱中获得好评。

北乡“花儿”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关注。2002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民间文艺家协会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2002年—2003年行动项目组专家先后深入到刘家峡和炳灵寺附近的王台镇塔坪村实地聆听了“花儿”歌手们优美的唱腔,并采集收集了大量的歌词和其他有关资料。2003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编印的《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永靖歌手李贵洲、孔承扎、司福莲演唱的三首北乡“花儿”。2004年10月,永靖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民歌考察采集地”。“花儿”登上了艺术的高山,望见了花儿的平川,从山野民间走向了世界。2009年9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与我国其他21项非遗项目一同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儿”成为甘肃省第一个世界级“非遗”项目。这不仅是我们甘肃人的骄傲,也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花儿”申遗成功,为北乡“花儿”这株民间奇葩更加茁壮成长,更加繁荣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我们衷心祝愿,北乡“花儿”这朵生长于黄河边的“野花”灿烂怒放,与祖国艺术大花园中的奇花异卉争芳斗妍。(连载二·全文完)



# 一方水土,一方方匾额

## ——清代陇南三仓河的匾额

□ 尹国库 尹永杰



杜蔚故居



“恭祝圣寿”匾

下款:生员杜蔚立  
下款为受匾者。生员,明清时指通过科举最低一级考试,取入府、县学的人,俗称秀才。而明清正式科举考试分三级:一乡试,二会试,三殿试。科举考试资格也要求十分严格,先童试称“儒童”或“童生”;二称为生员,录取入学后,又称廪生,俗称秀才,这是走功名的起点。由此可知杜蔚当时的身份乃是生员,这一点吻合当地人口述,其人考取功名后,携家眷赴外做官,未归。如今,三仓仅存杜蔚故居一幢,手札一卷。

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药,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成州同谷县,即今陇南市成县,与武都区接壤。唐安史之乱时,关中地区大乱,杜甫曾携家眷寓居成县避祸。然而,在乱世衣粮匮乏,生民维艰,杜甫一家依靠采集野果渡日,不幸的是几个儿女也惨遭厄运。“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杜甫在其诗《同谷七歌》中记载了这段穷困潦倒,凄惨悲凉的生活。

据史书所载,杜甫家人众多,在当时的境况下,不可能全部坐等饿死,其中有子逃荒他地就食也是情理之中。因此,距离成县较近的武都、西和、徽县、康县等地,就成了杜甫子女最有可能前往的地区。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沟通艰难,又时值战乱,因此杜甫一家重聚的可能性极小。况且,安史之乱

平定后,杜甫也并未飞黄腾达,几年后离世,重聚家人也就不再可能。杜甫子女从此也就在流亡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也为“工部世裔”匾的真实性,以及武都三仓杜氏族人杜甫后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工部世裔”匾的流传来看,无论武都三仓杜氏族人实为杜甫后裔,还是杜氏族人伪冒先祖,攀附名人,都足以说明杜甫对整个陇南地区的文化影响

匾”的存世,更是杜甫文化在陇南薪火相传的实证,三仓文脉赓续的明证。

“恭祝圣寿”匾,悬挂于三仓镇闹院村戏楼正前方,闹院戏楼乃清光绪九年“九龙观,六会善士,修设梨园,重制衣冠,诱川陕商贾,引阶文工匠,耗银数百”修建而成。其匾,绢质,为蜀地绢帛,其色朱。当地称绢制匾额为软彩,是相对于木质匾额硬彩而言的。匾分上款序言,匾文及下方头人,下款题、写人、六会总头人以及年款三部分。

序言部分以程式化书写开头“尝闻山不高而雅秀……”,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清代三仓戏的第一手资料。匾文“恭祝圣寿”,榜书色墨,字体庄重浑厚,经岁月洗礼尤显古朴。恭祝,恭敬地祝贺或祝愿;圣寿,是皇帝的年寿和生日。恭祝圣寿即恭敬地祝贺九龙观七曲文昌川主惠民大帝生日。匾文下方头人部分,写光绪九年组织修建戏楼的六会头领。下款:六会总头人九人,题写者乃师生二人,业儒杜永发题、学生杜生荣敬书。颜体年款,光绪九年孟春吉旦。孟春是春季的首月即农历正月月份;吉旦,农历每月初一,也泛指吉祥的日子。由此可知题写该匾的时间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

(连载二)